

正統與異端的界限，精英與世俗、正統與異端並非是絕對的對立，這二者之間更多的是一種互補相生的關係。本書出版後在學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書中關於中華文化多元性與統一性的問題引起學界的長期熱議。繼華琛「神明的標準化」之後，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蘇堂棟(Donald S. Sutton)的「偽標準化」與康豹(Paul R. Katz)的「異端標準化」，從政府的效能、地方的能動性對其進行了修正，科大衛(David Faure)、劉志偉又通過「正統化」概念的提出，對華琛的觀點進行延伸，為中國文化的多元一體提供了時間和時刻的維度。可以說，學術界關於這些問題的探討越來越深，前述各章節內容並非問題的終點，反而成為我們繼續思考和追尋的重要起點。

王文靜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楊斌著，韓翔中譯，《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新北市：八旗文化，2021年，462頁。

在中國邊疆史學過去的研究中，學者經常會不自覺地以一種「從後往前」式的視角去解讀區域社會的融合進程，而歷史自身卻只能「從前往後」式發展，如何走出這種視野上的困境，還原社會真實的發展軌跡？楊斌《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一書，為研究角度上的突破提供一條可思考的路徑。作者以長時段與全球史的角度，將雲南置於研究主體，試圖最大限度還原雲南從古至今正向的發展與變化歷程，從非漢「中國人」的形成過程來關照今日中華民族之形成，即該版本序言之標題「何以雲南？何以中國？」本書原是作者2004年時完成的博士論文《*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Second Century BCE-20th Century CE)*》，200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2021年，臺灣八旗文化將該書首次譯為繁體中文，譯者韓翔中。全書共七個章節，兼結論與序、跋各一篇，分別從交通、軍事、制度、身份認同、經濟與近代民族識別等角度進行討論。

導言部分，作者明確指出美國新清史對南方中國關注的不足，清代繼承明王朝在南方大部分的治理成果，本書便試圖在研究與對話中對這些問題進行補充。其次，作者重點探討「西南」這一學術名詞的範疇，在方國瑜等學者雲貴論基礎上，提出本書採用的雲南中心論觀點，為本書的研究劃定範

圖。同時，作者也補充本書研究的缺陷所在：以雲南為研究對象卻缺失雲南本土人物的書寫，以全球視野為中心卻過度依賴中文文獻，宗教文化思想與疾病地理等領域未能涉及等。

第二章作者分別探討雲南至四川、緬甸、越南和藏區四條古交通線路。在中亞道路堵塞的前提下，西南通道由此開始繁榮，例如滇馬在廣西叛亂、越南、孟加拉、印度諸國內戰中便產生過相當程度的影響。同時從元代站赤制度到明代驛站和清代堡站，國家力量也進一步固化這些軍事運輸線路與商業貿易通路兼備的古道。雲南的這幾條通路共同作用，實現中原內地造紙術、火藥等為代表的諸多華夏文明在東南亞的傳播。道路貫通後，便是進一步的軍事行動，第三章，作者指出雲南與華夏歷來的交往，往往都是建立在中原試圖實現對雲南以外地區溝通的基礎上。莊蹻入滇，實為秦楚；西漢設郡，意在大夏；諸葛化夷，連吳抗曹。這些是中國內部逐步擴張的推動力，強化雲南對於中原的東南亞樞紐價值。隨後，作者重點梳理唐與南詔旋復叛的交往歷程，在地緣關係的制約下，南詔在藏區與漢地之間不斷搖擺，並在這種搖擺中積累力量，於漢藏之外的中南半島確立自己的朝貢體系。第四章制度部分承接上章的唐朝，轉以明清制度為主，引出蒙元統治下，土人、官僚、宗室三足鼎立型態在雲南的確定。而明代對雲南統治權的掌控，主要出於朱元璋對養子沐英的絕對信任，有明一代除段立沐，當地再無可與中央王朝抗衡的省一級地方力量。清代則利用以夷制夷等手段進行改土歸流，打破當地的權力結構，將中央控制權滲透到縣級區域的同時，也迫使地方權力萎縮到縣級區域。同時，中央王朝對於土司跨界紐帶和內部秩序的危險性也有着深刻認知，遂採取土司強制族譜敘述、接受儒家教育、不許通婚等措施，控制其族群內部力量的膨脹與聯結。

當上層制度層面落實後，隨之而來要面對的是人群做出的現實反應，第五章雲南人的省級認同觀念形成過程的討論是全書核心，也是本書主要學術貢獻所在。在梳理歷朝雲南外來移民的基礎上，作者通過與余英時、李中清、陸韜等的學術對話，探討「華化」與「漢化」問題。最終作者選擇從「華化」的維度，論述雲南的移民借助包括制度上驛、堡、鋪、哨的設置，社會上佔據城市土地塑造全新區域格局，教育上官學、衛學、社學、書院與國家科舉相配合，習俗上影響土人適應儒家道德觀念等諸多方面，進行華夏傳統在當地社會的培植與固化。然而，作者在此基礎上論述雙向的漢人「土著化」現象。從南中大姓放棄原來身份認同尋求現實利益，到漢人通婚快速融入當地社會結構，地方阻力為移民帶來雙重的身份認同。作者借用並發展

了美國學界使用的「中間地帶」的概念，在華化、土著化二者之外，更多處於核心、外圍、邊緣、空白區域等不同的人群劃分，被一個統一的「雲南人」省級身份認同所容納，並借助國家科舉籍貫制度進一步塑造與強化，地方認同與中國認同二者遂並行不悖，互為表裡。在「雲南人」這一雙方權力談判結果後，本土阻力下長期互動形成的「中間地帶」，便是「何以中國」的解答。

第六章的寫作孕育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此處已略有雛形。作者以銀、貝幣和銅礦三類為線索，補充土司開採白銀流入中南半島的一些線索。之後作者詳細討論貝幣退出雲南市場的歷程。中原王朝分別於1555年、1576年、1625年三度鑄錢，嘗試令雲南市場接納銅幣，決定性時刻則是孟加拉貝幣成本的飆升，才致使古老的貝幣體系徹底退出雲南市場。銅礦開採是清政府緩解雲南治理成本的一項制度經營，其中蔡毓榮與貝和諾不同的落實方式導致銅礦在雲南的興衰起伏，滇銅貶值最後不光無利可圖，還導致兵變與地方回亂。第七章近代雲南民族識別部分，作者通過材料，提出地方治理中族群菁英的決定性作用；當下的民族自治制度大體上是對土司制度功能上的繼承；從劃分結果上看民族識別數目類似於朝貢制度的劃分等的思考，以及各民族以放棄舊有內部權力體系，承認新中國民族識別來換取現實發展空間的構想。結論部分，作者再次強調本書以全球視角和中國視角相結合的學術創新，考察了在一系列國家經營中逐步塑造出今日之中國的過程。非漢人群的中國認同不僅僅豐富「中國人」這一概念的內涵，更加決定了今日「中國人」概念的範圍。「就是在此一歷史進程中，一個中華民族的多族群『形象/實體』（image/reality）得以創造。」（頁357）

本書自2009年英文原版出版後，就有多位學者進行過評論，2021年繁體中文版出版後，又在大陸學界引起過激烈爭議。2021年9月9日，由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主持，作者與蔡偉傑就雲南與新清史研究進行過一場線上論壇，探討清王朝的國家屬性問題。在傳統內亞研究基礎上，作者從目前工作重心所在的海洋亞洲領域出發，強調清帝國從明王朝繼承而來的東南亞屬性。2022年4月9日，由雲南大學民族與邊疆學部主辦的「何以邊疆？何來中國？」研討會，重點則集中在作者書中所表達出來的「中國滲透」（頁354）學術立場上。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的概念，綑綁了當代多數學者對於東亞大陸整體歷史的理解（富察，2021論壇），作者選擇全球視野觀察雲南的原因，即處於突破慣性思維綑綁的考量，來還原歷史真相；大陸學者

在肯定全球視野的必要性時，則多數表達「全球史觀不是去中國化」的原則。Roderich Ptak 在書評(*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0, vol. 41, no. 2, pp. 341-342)中肯定作者所關注的中印度通道中雲貴高原的重要性，他表示這一通道中雲南的向北性特質不可忽視。

作為本書重點之一的全球書寫，共有三條線索：中南半島以滇馬為代表的商貿溝通、南詔建立過的朝貢體系、東南亞貝幣體系，作者又以貝幣部分的論述最有創新。在本書的全球化視角下，貝幣系統象徵着印度洋的經濟貿易體系，隨着西非黑奴貿易的逐漸發達，孟加拉發生經濟鏈條的崩潰，貝幣系統與背後的印度洋貿易體系在雲南徹底退出，這恰恰幫助清政府減少了在雲南的治理成本。C. Patterson Giersch 在書評(*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10, vol. 115, no. 4, pp. 1116-1117)中提出貝幣在雲南的退出似乎與價格無關。筆者在楊斌與 C. P. Giersch 討論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貝幣退出雲南的時間，恰逢雲南又回到中央羈縻乏力的地方政權時期，只是對比南詔大理，這次的地方勢力來自中原。與中央王朝治理時首先考慮的治理成本不同，強有力的地方政權似乎更能有效貫徹其制度。故而貝幣在雲南徹底退出的多重因素當中，還需要考慮到制度的強制執行，這一驅動力，即雲南「向北性」根源所在。其次，作者通過貨幣體系由貝轉銅，納入中原的過程，以期體現出一種地方阻力、國家治理、全球史觀交織的歷史進程，但最終呈現出一種負面的國家干預經濟的論斷，劉志偉等諸多學者對中國的貢賦經濟體系運作原理進行過長期而深刻的解釋，可對這一結論進行修正。Michael Brose 在書評(*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0, vol. 17, no. 3, pp. 305-309)中補充明清兩朝貨幣化進程的快速發展需求下，正是豐富的銀銅資源儲備，才幫助雲南徹底融入中華帝國的網絡中，成為如今不可分割的雲南省。

「雲南人」省級身份認同觀點的提出是全書的另一個重點，是作者在何炳棣研究基礎上發展出的想法，且着重強調人群融合轉化的雙向互動特徵，即華化與土著化。這種雙向轉化在一個「中間地帶」中達成某種平衡，以雲南人的統一形象展現出來。蔡偉傑在會議中建議將身份認同這一「描述性」概念轉為「分析性」概念，比如補充法律層面身份的判斷標準。董子昂(*ICCS 現代中國學ジャーナル*, 2022, vol. 15, no. 1, pp. 69-73)補充華夷之外如明清雲南穆斯林等的自我身份認同等視角。同時，「雲南人」省級身份認同的確立是元代行省制度在地方有力落實最為確切的證明，筆者以為不能用作者採用的科舉籍貫制進行解釋，而忽視其背後基石作用的行省制度。其次，作者華化的主要描繪對象是移民社群中如何複製出一個中原社會，土著

化則更多筆墨集中在還原出一個典型案例，發生認同轉化的背後，土著社會當地是否發生過階級層面的變動，筆者認為可進一步論述，畢竟，新階級的誕生才能標誌着一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轉化。

最後，本書土著化書寫所用的材料都是漢文移民史料，甚少雲南本土材料，也和作者導言中所說的缺失雲南本土人物的書寫相對應。例如本書第四章的三國時期，作者將當今西南流傳的諸葛亮故事的傳說看作是中國人的發明（頁152）。實際上這些傳說更可能是明清雲南本土人群為了自身社會秩序能夠在新的王朝中得以維持，進行的自發式書寫創造。董子昂書評中曾評論「作為區域的雲南是關心雲南本身；作為自我認同的雲南是將雲南作為通往中心的路徑，解決中心的問題，本書明顯屬於後者。」如若從「關心雲南本身」出發，去理解「雲南人」在歷史進程中所做出的每一個選擇，「何以雲南，何以中國」的問題也許還會有全新的解讀。

劉雅君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程美寶，《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327頁。

從《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到《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程美寶歷經15載，目光逆歷史之河而上移至18世紀。她對作為區域的「華南」和文化史的關注貫穿前後兩本書。她始終關心的是：在某些歷史關節點，「華南」作為一個「區域」所經歷的宏觀社會變遷，而經歷着這些的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各顯神通，參與文化建構。但新作試圖超越舊作的努力也顯而易見。作者將歷史人類學對基層社會運作的基本關懷引入文化史研究，打破「文化是讀書人的事情」的慣常思路，把因不善文書而鮮少留下歷史印跡的普通人從史海打撈出來，還他們一個「締造世界的先行者」的名分。筆者作為一名社會科學研究者讀罷這本小書，在方法論層面感到深切共鳴，在實證發現層面收穫啟發的靈光。

一般認為，文字是進入知識世界的基本媒介。這本書卻解答了一個有趣的悖論：在清代的廣州口岸，那些不怎麼識字的人又是如何參與知識的跨文化傳播和生產呢？作者用心琢磨和拼接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字碎片和圖像資